

上铺的兄弟

吴云涛

1978年初秋的一天,我到宿松师范报到,朱春槐同学在我之前先到了寝室。说是学生寝室,其实就是一间旧教室里摆放十几张高低床。高低床分上下铺,我把行李放在一个下铺上,却被一位同学移开,似乎他已抢占了下铺。春槐见我愣在旁边,就把他已经铺了被褥的下铺让给了我。他笑着说,他喜欢睡上铺。这是我俩第一次见面。

我们那时是初中毕业考取了县师范,才十几岁。乡下孩子进城,见人都怯生生的,我和春槐进出校园经常邀约一起。那个年代,做文学梦的少年特别多,例如我俩。我们上街就跑新华书店、县图书馆和租书店。那时书店、图书馆挤满了人,一本书每天的租金一分钱。

学校的饭厅是一个破旧的礼堂。我们相约去食堂吃饭,一前一后排队。早餐我喜欢吃麦粉馍,可每月定量的馍票老是不够吃,春槐常匀点他的馍票给我。

学校在城郊,大门口东边有一方水塘,西面是连片的稻田。稻田间有狭窄的田坝,还有一条平坦的机耕路。早读课之前,总有三三两两的同学在机耕路上漫步,诵读课文。清晨,我和春槐也习惯在田间结伴而行。

春槐沉迷文学,有段时间基础课在考试时掉了队。那段时间他比我起床早,踏着小草上的露珠到田坝上去复习。田坝上泛着霞光,漾着清新的空气。我有次发现了他的一个小秘密:他的课本中还夹着一个软面抄,里面全是他抄写的外国诗人的诗,普希金的,屠格涅夫的……他补习基础课时,还是丢不下他对文学的

痴爱。

我们的家在一个乡,相邻的两个村,就读的却不是同一所初中,我们都是以比较高的分数直接考进中师。当年的高分大都选择读中专,可以为家庭分担一点经济压力。那时我们两家的经济状况都不太好,有几次周末,为节省车费,下午放学之后,我俩沿着二郎河坝溯水而上,步行二三十里路回家,到家时已是夜深人静,两岸灯火点点。

师范毕业之后,我们分配到了同一所山区小学——原铜铃乡辅导小学。他教四年级语文,我教五年级语文。学校处在一个叫南屏庙的山岗上,我俩合住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砖瓦房里。那时山区小学早、中午上课,下午不安排课。参加工作第一天的中餐是在房间里吃的,我俩把从食堂端来的两碟子小菜放在办公椅上,对喝了一瓶白酒。

半年后,春槐调到了更为偏远的三冲小学。那里是深山区,交通不便,生活条件不太好。我有点替他担心,周末去看他,他还是那副散淡平和的模样。他房间里养了几钵兰草花,桌子上摆放着几本诗集。

后来我调到邻乡的一所初中任教,再后来改行从政,平时同春槐见面不多,只是过年的时候相互间还走

动。多年后,我进城工作,家也随之搬进了县城。春槐又回到了铜铃铺小,他爱人在学校代课,他和爱人每年都要回老家的旧宅过暑假。有几年我把上小学的女儿送到他老家度暑假,我同爱人也常过去转转,两家像亲戚一样。

日子就这样清澈而平缓地流淌着,春槐安平乐教,是远近都有好口碑的教师。我能感受得到,他对做乡村老师是很满足的,乐在其中。

几年之后他在县城买了套间房,那时他儿子也大学毕业了。他在二郎中心小学任副校长,依然带课,周末住城里,我同爱人周末常去他家蹭饭。

2017年春,组织上安排我到县教育局任职。教育系统人多事杂,到任后我和春槐好长时间竟没见面。有次他到局机关办事,顺便到我办公室坐了一会。他对我说,想辞去学校副校长的职务。我问为什么,他没有作声。后来我才了解到,他是想腾出岗位给年轻人。

有一天,听说春槐身体不舒服,我同爱人去看他。他说背部疼痛,痛得晚上睡不着觉。我劝他有病抓紧治,尽早外出检查一下,他说学校有些事情一时丢不开,先捱几天看看,要是不痛了就算了。

得知春槐检查出脊椎瘤已是几

个月后的事。他的家人陪着他去杭州的医院检查,没有确定是良性还是恶性。我再去看他时,他明显消瘦了。后来他爱人和儿子陪他到北京的301医院做手术,手术比较成功,但病原体不明确,留下了一丝隐忧。

他很快就回校上班了,周末见面,感觉他的状态不错,我也为他高兴。过了一年多,又听说他身体状况出现了反复,在学校连上下楼梯都困难。校长劝他回家休息他又不愿意,学校只好把他的住房从三楼移到一楼。

终于还是躲不过病痛的折磨和亲人们的苦劝,春槐同意外出复诊,这次是去云南的一家医院。那天早上我去给他送行,我们聊了许多学校里的事情。他爱人打断我们的交谈,说要赶火车,等他从云南回来再聊。

哪知道,这却是我们之间最后的见面。

这个当年睡在我上铺的兄弟,我总不敢相信他已经走了。读书的时候,我们还讨论过春槐的名字。槐树分国槐和洋槐,他这个“槐”,不是那种“九棘三槐”中的国槐,只是普通的洋槐。洋槐就是春槐,在乡村很常见很实用。洋槐在四五月间开花,洋槐花晶莹、纯美、脱俗。



夏日田野上的那一座座瓜棚,守护的是一地的瓜香,更是农人一夏的希望。

我的老家位于皖中丘陵地区的一个村落,由于旱地偏多,乡亲们有在岗地上栽种西瓜的传统。

每年打春,他们就把田地犁成一条条长垄,再用铁锹把垄上的土块拍碎,将墒沟铲平,以确保雨水时节地里不会积水。在此之前,他们就挑了块肥沃的地,罩上塑料薄膜,撒下的西瓜种已经长出毛茸茸的叶片,可以移栽了。栽苗之前,先在垄上挖好小墒,里面铺上一层厚厚的农家肥,就像给它们筑了一个温暖的巢,将瓜秧根部用泥土包裹好,然后小心地移到垄上的墒中,将瓜秧扶正,用细土覆盖好根部。栽好瓜秧之后,要连续三个傍晚给瓜秧根部浇透水,乡亲们管这叫“定根水”,待到瓜秧的根须与周围的泥土混熟了,瓜秧便立起了腰身,脸色也活泛起来。

入夏之后,瓜藤见风长,渐渐的,便覆盖了田垄。乡人们手持剪刀来到瓜地,挨个儿给每一条瓜藤打岔,断去它们抢夺主茎营养的念頭。

迎着南来的熏风,浅黄色的瓜花含羞地在藤上翘起了嫩头,举起了小手。沿着墒沟,挨个儿细瞧的乡亲们再也掩不住嘴角的笑意,他们从瓜花下方支起的一枚枚小小青果中,已然看到了青色花皮的大西瓜正静卧在浓绿的叶片之中。

每一朵瓜花,在乡人们的眼里,都是一个滚圆的大西瓜。他们在毛茸茸的瓜纽下方,用平底铲刀,挪出一块平整的土地,好让来



水上人家 张云 摄

日落地的西瓜,有个安身的好场所,美美地睡上一个安稳觉。

待到西瓜长成拳头般大小,家家户户便动手搭建看瓜棚,父亲选中了西瓜地南面田埂中间的那块平整地,先是埋下四根长木桩,然后在一人多高的顶部,用毛竹扎了个斜坡的棚顶,铺上芦席,再用稻草覆顶,顶上压上一些树枝,以防被大风揭去稻草。

四面通风的看瓜棚里,放置着一张凉床,挂上一顶蚊帐。看瓜棚倒不失为纳凉的好处所。自打地里

的西瓜长到碗口一般大时,夜晚的瓜棚里便少不了看瓜人。看瓜人的手中握有一只只能装三大节电池的手电筒,尤其是在漆黑的夜晚,一打开手电筒,一道雪柱似的亮光便射向远方。明月朗照的夜晚,看瓜人通常不开手电筒,只是在上半夜,隔上半个时辰便沿田埂边绕上一圈,遇到突然闪现的黑夜,摸不清是动物还是人,便干咳几声,这几声干咳在空旷的田野中回荡,如若偷瓜的,定然不敢再往前挪步。

一天晚上,陪父亲看瓜,月色

朦胧中,我发现东边好像有两个人影在瓜地里晃动,我从父亲手中拿过手电筒刚要照过去,父亲一把夺过手电筒说,哪有人影啊,是你花了眼看错了。随后,我见到两个人影从瓜地里爬起身,顺着稻田埂往庄子里跑去,我对父亲说,看,两个人正在田埂上跑。父亲说,算了吧,地里的瓜多着呢,小孩子偷个西瓜馋馋嘴,没啥大惊小怪的,别吓坏了他们。有天夜里,天下起了大雨,特别凉爽,我们躺在瓜棚的凉席上,听雨点砸在西瓜地里的窸窸窣窣声,听西瓜秧大口大口喝着雨水的滋滋声,听雨点敲击西瓜的咚咚声……渐渐进入了梦乡。第二天一早,父亲顺瓜田埂转了一圈,发现西边的那几笼西瓜秧被翻了个身,好多藤头都被踩进了泥里,有的瓜秧被弄断成一截一截的,父亲心疼地把泥里的藤头理出来,把瓜秧重新翻过身,他一边干一边叹息。我知道,丢失了几只西瓜,对于父亲来说,倒不那么惋惜,他恼的是偷瓜人不该糟蹋了瓜秧,糟蹋了那么多未成熟的毛茸茸的小西瓜。

西瓜成熟的时节,好客的父亲常下到地里,亲手摘上一两个大西瓜给路过的乡亲们品尝,只要听到乡亲们说瓜香甜可口,父亲的笑声就比西瓜还要甜。收获了西瓜被父亲用平板车拉到集市上售卖,买完西瓜,归来时,父亲会捎上几斤猪肉,几块豆腐,我们的碗头上又有了久违的肉香。

在我的老家,圆圆的西瓜里,包裹着的不仅是乡亲们圆圆的梦想,更是乡村生活的别样甜蜜。